

# 從《四庫全書總目》〈史部 史評類〉對於 所錄明代著作的評述分析明人的史評論著

張維屏\*

## 摘 要

本文討論的重點，在透過對於《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史評類〉所錄明代著述的評價，分析明人史評類論著在學術淵源與時代因素影響之下，所呈現的若干特點。《四庫全書總目》站在特定的政治立場與學術觀點上，認為明人的史評論著多乏學術根柢，詞藻亦多浮誇。然而明人對於《史通》版本刊正的貢獻，以及在評釋詮解《史通》著作上的努力，成果豐碩。另一方面，雖然普遍而言，明人史評論著依據的史實頗有不足。但是，在歷史淵源與學術傳承的影響下，司馬光《資治通鑑》與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兩書的書法義例與立論精神，仍被明人史評論著奉為主臬，立為撰述旨趣的先導標竿。此外，明朝由於私人撰寫當代歷史的風氣頗盛，又在明代中晚期時局日益動盪的雙重影響之下，晚明出版的史評論著中，也不乏運用借古諷今的筆法來影射當世的著作。再者，明代史評論著因具史學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的通俗形式與普及功能。明人的史評著作在晚明時期也開始影響時代社會，成為鄉塾童蒙與應試舉業教材中的一種。

**關鍵詞：**《四庫全書總目》、《資治通鑑》、《史通》、明代史學評論

## 一、前言

本文討論的重點，在於從《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史部·史評類〉對於所著錄明朝士人撰寫的史學評論著作的評述，分析明人史評論著在學術淵源與時代因素的影響之下，所呈現的若干特點。雖然，《總目》是站在特定的政治立場與學術觀點上針砭明人的史評論著。然而，透過《總目》所標舉的明代史評著作的特性，可以進一步辨析明人史評論著蘊涵的學術淵源，以及在明代史學發展歷程中的定位。時局的因素與時代的風潮，影響了明人史評論著的撰述方向。另一方面，透過明人史評論著顯現的史學通俗形式與普及功能，亦可略窺在學術與世變的雙重影響之下，明人史評著作所發揮的社會功用。<sup>1</sup>以下分別由：《四庫全書總目》評述明人史評論著的基本立場，明人對《史通》版本的刊正與衍生的評釋著作，學術淵源與時局因素影響下的明人史評論著，明人史評論著的歷史教育功能與普及化的應用，等四個主題分別論述。

## 二、《四庫全書總目》評述明人史評論著的基本立場

在《總目》的視野中，對明代史評論著的整體評價並不甚高。認為「明

---

<sup>1</sup> 本文所謂的明人「史評類」論著，全依《總目》〈史部·史評類〉所輯錄的書目定之。其餘散見明代私人諸家文集、筆記的史論意見，因不專為「論著」，不在《總目》的蒐羅之列，所以本文皆未加以論析。



代史論至多，大抵徒侈游談，務翻舊案，不能核其始終。」<sup>2</sup>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總目》本身就是一部在清乾隆朝若干具有考證學背景的四庫館臣們主持修纂的，是在帶有高度政治敏感與時時仰承上意的陰影下所完成的著作。因此，在《總目》裡呈現的政治立場與史學觀點，是完全篤守清代欽定御製，如乾隆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之類的史論思想。<sup>3</sup>所以，在這種觀點的檢視之下，對明人史評論著中關於正統歸屬之類的問題，態度也特別審慎。譬如《總目》提及商輅（1414-1486）撰寫的《蔗山筆塵》說到：「是編雜論史事，僅三十三條，頗好持異論。如謂宋天書事亦有深意，不可盡加訾議，是何言歟？」<sup>4</sup>對照商輅書中有關「宋天書事」的一段原文：

余嘗謂，真宗，宋室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賢相。然天書事不免於訾議。愚意宋承五代之後，五代之君率一、二傳即易。宋到真宗時亦先朝鼎革之會，天下豪傑未必不興覬覦。此時契丹甚盛，亦安保無睥睨中國意。故假天書以示眷祐之意。所以內安人心，外警夷志。當時大臣之計必出於此，有不可對人言及形之史冊者。余窺之意外，似得其深也。<sup>5</sup>

兩相比較之下，即使對於宋朝當時的歷史背景缺乏深入理解，也可以發現其中《總目》所持立場的關鍵所在。商輅本人熟諳史事，曾另著有《通鑑綱目續編》一書，因此他的立論並非全然的無的放矢。但是在身處乾隆朝中期纂修《總目》的四庫館臣眼中，商輅所言自然顯得頗為不合時宜。否則如果遽然認為商輅對於「宋天書事」的說法可以成立，那麼當今天子又該置於何地？由此觀之，《總目》特別標明這一段敘述加以駁斥，其中

<sup>2</sup> 《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88，頁755。以下簡稱《總目》。

<sup>3</sup> 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274-276。

<sup>4</sup> 《總目》上冊，卷89，頁759。

<sup>5</sup> [明]商輅，《蔗山筆塵》，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81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影印，1996），頁197-198。



蘊涵的政治意味不言可喻。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總目》對於明人史評論著的評斷之中，也包含了學術的眼光。清朝中葉，沿著明末清初以降漢學的興起，學術風氣逐漸由空返實。因此，《總目》也鮮明地表現出反對空疏，注重徵實的思想傾向和學術特徵。全書將「考證精核」奉為正宗。在評騭學術流變與典核古籍書冊時，也特別強調「謝彼虛談，敦茲實學」的立場。<sup>6</sup>在這種標準之下，明人史評著作中符合裴松之《三國志》注、劉知幾《史通》、吳縝《新唐書糾繆》以及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等書的撰述原則或方法的著作方為《總目》所青睞。朱明鎬的《史糾》就因此被讚譽為，內容「參互考證，精核可取者甚多」。<sup>7</sup>

相對而言，《總目》對於書名標榜論析史書義例，而實際上作者自我發揮居多的明人史評著作，會站在學術評斷的立場上，直率地加以批駁。明萬曆年間張之象（1496-1577）撰述的《太史史例》一書，在絲毫未根據前人說法的情況下，將《史記》分成二百八十九種類例。《史記》每一卷的原文被割裂抄錄在各類例的標題之下。<sup>8</sup>這種缺乏考證依據的創新說法自然是《總目》所難以接受的。《總目》既然認為「太史公書未可以定法拘之」，因此，張之象的分類方式未免畫蛇添足，是「以說春秋家之窠臼移而論史。」<sup>9</sup>在《總目》看來，實為一部缺乏學術根柢的著作。

《總目》認為明代士人撰寫的史評類論著學術價值不高的另一個原因是，《總目》往往認定明人的史論意見缺少真知灼見。其中有些是因襲前人的議論，有些則是缺乏獨到的見解。例如夏寅（1438年進士）《政監》一書的書寫格式是每一段開頭先摘錄一段《尚書》、《春秋》以及歷朝正

<sup>6</sup>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頁372-375。

<sup>7</sup> 《總目》上冊，卷88，頁755。

<sup>8</sup> [明]張之象，《太史史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83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長水書院刻本影印，1996），卷1，頁100。

<sup>9</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2。



史的原文，之後在末尾附加作者自己的按語。按語中不見引書佐證，全屬個人議論的陳述。<sup>10</sup>因此，《總目》直接判定作者的按語，「皆前人緒言，無大闡發。」<sup>11</sup>類似的評語在《總目》中不乏數見。譬如對於慎行（1545-1607）的《讀史漫錄》，《總目》認為其書評論歷代史事，「無甚乖舛，亦無所闡發。」<sup>12</sup>范光宙撰寫的《史評》，作者雖自負內容主旨「竊附溫公、晦翁微意」<sup>13</sup>，但是在《總目》的觀察中，仍屬「多襲前人緒論，罕出心裁」<sup>14</sup>之流的著作。明萬曆年間涂一榛（1604年進士）的《尚友齋論古》書中內容是擇取自春秋時范蠡迄至南宋文天祥等六十八名歷史人物做為評論的對象。《總目》的看法是，其「去取絕無義例，議論亦多陳因」<sup>15</sup>，從體例與論述上同時否定了整本書的價值。

在明朝人撰寫的史評類著作中，某些作者自以為是的獨創見解，在《總目》的視野中，實際上根本不值一顧。陳懿典（1592年進士）《讀史漫筆》摘鈔《史記》各卷〈本紀〉、〈世家〉、〈列傳〉事蹟，隨附個人的評語。有時僅評論簡短的一、二句，例如評「李廣」云：「李將軍最不得意事，乃太史公極得意之文。」<sup>16</sup>既乏申論，也無引證。無怪乎《總目》定其書「皆陳因膚廓之言」<sup>17</sup>，全面的否定了作者書中的自創見解。

如前所述，《總目》是站在特定的政治、學術立場上，對著錄或存目

<sup>10</sup> [明]夏寅，《政監》，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81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明成化十六年〔1480〕刻本影印，1996），卷1，頁203。

<sup>11</sup> 《總目》上冊，卷89，頁760。

<sup>12</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2。

<sup>13</sup> [明]范光宙，《史評》，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81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清順治十五年〔1658〕刻本影印，1996），「凡例」，頁588。

<sup>14</sup> 《總目》上冊，卷89，頁760。

<sup>15</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3。

<sup>16</sup> [明]陳懿典，《讀史漫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86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影印，1996），頁166。

<sup>17</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3。



的古籍展開論述的。對於明人的史評論著，或多或少也帶有若干先入為主的成見。雖然如此，《總目》在分析明朝士人撰寫的史評類著述時，並非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總目》運用的方法，是依循著考證的目光，很細膩地分析其中的細節，對書中內容分別給予不同的評價。例如《總目》對於洪垣（1532年進士）撰述的《覺山史說》書中個別段落的評價分別是：「頗能主持名教」、「不免文士好奇，務為新論」，以及「紕謬至極」三種南轅北轍的看法。<sup>18</sup>「頗能主持名教」，毫無疑問的，是屬於正面肯定的評斷。「不免文士好奇，務為新論」則是《總目》對於明人議論的總體評價。相近的例證如，「大抵好為異論。務與前人相左」，以及「務欲出奇勝人，而不知適所以自敗，前明學者之通病也。」等評語皆是《總目》針對唐順之（1507-1560）的史評著作《兩漢解疑》與《兩晉解疑》提出的看法。<sup>19</sup>同時也包含了對明代士人議論的一般印象與意見。而同一本書中，《總目》所提出全然否定的說法，認為書中包括「紕謬至極」部分的原因在於：一是認為其間的考證功夫未為完備。二是原文的敘述與清朝官方的修書立場顯然頗有違悖之處。<sup>20</sup>由此看來，《總目》為同時兼顧自身修書的政治立場與學術觀點，在面對明人史評論著時，是會非常細膩地分別評析書中內容，運用微觀的分析，得以明確的突顯《總目》意欲傳達，對於明人史評論著評價的基本立場。

### 三、明人對《史通》版本的刊正與衍生的評釋著作

《總目》〈史部·史評類〉將唐朝劉知幾（661-721）撰寫的《史通》視為史評類論著的開山鼻祖，稱讚劉氏「於史學最深。又領史職幾三十年，

---

<sup>18</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2。

<sup>19</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2。

<sup>20</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2。



更歷書局亦最久。其貫穿今古，洞悉利弊，實非後人之所及。」<sup>21</sup>《史通》一書，除了對史學的源流與發展，以及史學的功能與體用，史學著作的結構與形式，都作了系統的析論之外，並進一步對史書記載的紕謬提出批評。<sup>22</sup>是對史學展開批評討論的先驅，<sup>23</sup>同時，對後世的史家也影響甚大。<sup>24</sup>因此，《總目》的評語應該可以說是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地反應了《史通》的歷史定位。

《總目》所輯錄的幾部明朝及清初士人衍釋註解《史通》的著作，究其成書緣由，是和明代中期開始對《史通》版本展開一系列的刊正工作緊密相關的。此一《史通》版本刊正工作的形成背景，簡單地說，是因為從唐末至明初，《史通》的流通未廣，所以流傳至明代時，《史通》的許多通行刊本內容已經產生了許多漫漶不清之處。<sup>25</sup>因此，明嘉靖十三年（1534）在四川任官左布政使的陸深（1477-1544）有感於當時通行的《史通》版本

<sup>21</sup> 《總目》上冊，卷88，頁751。

<sup>22</sup> 遠耀東，〈劉知幾《史通》與魏晉史學〉，收入氏著，《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2000），頁326。

<sup>23</sup> 李宗侗，《中國史學史》（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1），頁88。

<sup>24</sup> 林時民，《劉知幾史通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頁153。

<sup>25</sup> 或許因為《史通》在〈疑古〉、〈惑經〉等篇中「妄誣聖哲」的部分受到質疑，所以自唐代以降即鮮有相關研究的著作。從唐末至明初僅見唐朝柳璨撰寫的《史通折微》一部而已。（〔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第三冊〔台北：廣文書局，1967〕，卷7，頁549-550。）同時，在宋元明三代《史通》的流傳不廣。宋朝大儒朱熹猶以未見《史通》為憾。（〔唐〕劉知幾撰、趙呂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張之象〈史通序〉，頁1127。）明朝初年詔修的《永樂大典》雖然號稱網羅豐富，仍獨遺《史通》一書。（《總目》上冊，卷89，頁757。）明代曾經刊刻《史記百家評林》與《漢書百家評林》的文化名士凌稚隆，不識《史通》，甚至以為劉知幾是宋朝人。（〔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冊〔台北：廣文書局，1967〕，卷5，頁373-374。《史通新校注》，張之象〈史通序〉，頁1128。）由此亦可明瞭《史通》在明代之罕見。大體而言，《史通》自宋代開始即已鮮有善本。且訛字脫文之處所在多有，清通無誤的版本難覓。（《史通新校注》，頁1134。）



文字脫落，難以卒讀之處甚多。於是取蜀中明代善本為底本與他本互校，<sup>26</sup>開啓了刊正《史通》版本工作的歷程。

接續著陸深對《史通》版本進行校勘的是張之象。張氏於明萬曆五年（1577）在友人家人偶見字整句暢的宋刻本，細細比對之下，實較明代的蜀刻善本更勝一籌。<sup>27</sup>遂取之與陸深已經完成的校勘本相與銓訂，尋討指歸，對照校讎出另一部更為精核嚴謹的《史通》版本。<sup>28</sup>到了明萬曆三十年（1602），張鼎思又在陸深校本的基礎上，將《史通》全書進行了更加精密的一次校勘工作。將〈曲筆〉篇增加了430餘字，〈鑿識〉篇增加300餘字，並刪去其他篇中遭前代羈入的，共約60餘字的篇幅。<sup>29</sup>《史通》版本的刊正工作至此已經初步告成。從明萬曆三十年代以後才廣為流傳新校《史通》版本，至入清代，基本上標題與內容再也沒有經過太大規模的更動。<sup>30</sup>清乾隆十七年（1572）刊行的浦起龍（1724年進士）《史通通釋》二十卷

<sup>26</sup> 《史通新校注》，陸深〈題蜀本史通後〉，頁1122。陸深平日即對古籍興廢的情況與各地坊刻板本的高下等問題頗有研究。因此，陸深的學養適足以擔負刊正《史通》版本的工作。（〈明〉陸深，《續停驂錄摘抄》，收入，《紀錄彙編》15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卷134，頁10a-16b。）

<sup>27</sup> 《史通》的宋刻版本在明朝中葉已屬罕見。因此張之象的發現殊為難得。晚近至民國時代，根據洪業先生的考訂，宋刻版本《史通》幾已絕跡殆盡。（王鍾翰，〈記半通主人藏半部《史通》〉，收入氏著，《清史餘考》〔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頁345。）

<sup>28</sup> 《史通新校注》，張之象〈史通序〉，頁1127。

<sup>29</sup> 《史通新校注》，張鼎思〈續校史通序〉，頁1123。

<sup>30</sup> 在明萬曆三十年代前後，新校本的《史通》方才達到「通經學古之士，家有其書」的普及程度。（《史通新校注》，頁1130。）而從明嘉靖年間以降就已經出現的新校本《史通》，在萬曆朝中葉以前似乎流傳未廣。一般的士人或有不知新本《史通》的情況，僅根據舊版《史通》而橫生議論。例如焦竑（1540-1619）在其初刻於明萬曆八年（1580）的《焦氏筆乘》卷三中評論《史通·雜說》篇說道：「李陵與蘇武書，觀其文體，不類西漢。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為謬矣。」的一段敘述，焦竑因《史記》中並未摘錄李陵原「書」，遂引此攻詰《史通》的說法。而根據現代學者考證，焦竑應是依據未為完備的《史通》版本而有此說。如果按照新校版本而言，焦竑的論證基礎就難以成立了。（李劍雄，〈焦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82、246-247。）



共四十九篇的版本，是迄今流傳最廣的一種版本。<sup>31</sup>此本與明中葉陸深初見的《史通》十卷共三十八篇的版本，相較之下，無論在篇數與文字內容上都有很大的區別。<sup>32</sup>在十七至十八世紀中期的百餘年之間，經過明代士人的不懈努力，接近完整面貌的《史通》原著方得以繼續行世。

《總目》所輯錄的陸深《史通會要》一書就是衍生自《史通》版本刊正工作的一部著作。《總目》敘述其成書過程：

（陸）深嘗以唐劉知幾史通刊本多誤，為校定之。凡補殘刊謬若干言。又以其因習上篇闕佚，乃訂正曲筆、鑒識二篇錯簡，類為一篇以還之。復採其中精粹者，別纂為會要三卷。而附以後人論史之語，時亦以己見參之。<sup>33</sup>

《史通會要》的產生，擴大了《史通》一書的社會影響。對明朝史學的發展而言，饒富意義。<sup>34</sup>稍後沿波而起的有李維楨（1547-1626），依照張鼎思版本的《史通》略加評論。但其評論內容在《總目》的視野中，「不出明人游談之習，無足置論。」<sup>35</sup>爾後郭孔延接續著李維楨續作評釋，並雜引諸書證之，而完成了《史通評釋》一書。<sup>36</sup>郭孔延因為家學淵源，其父即曾根據陸深及張鼎思版本的《史通》做過文字校正工作的緣故。<sup>37</sup>所以郭孔

<sup>31</sup>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台北：里仁書局，1993），「目錄」，頁1-3。

<sup>32</sup> [明]陸深，《儼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68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86，〈題史通後〉頁552。

<sup>33</sup> 《總目》上冊，卷89，頁757。

<sup>34</sup> 錢茂偉，〈論明中葉史學的轉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6，上海，2001年11月，頁48。

<sup>35</sup> 《總目》上冊，卷89，頁757。

<sup>36</sup> 《總目》上冊，卷89，頁757。

<sup>37</sup> [唐]劉知幾撰、[明]李維楨評、郭孔延評釋，《史通》，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79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明刻本影印，1996），郭孔延〈史通序〉，頁3。



延的評釋，在《總目》的評價中，也較李維楨的評論來得有所依據。<sup>38</sup>

時至晚明，王惟儉（1595年進士）又根據李、郭二氏的《史通評釋》重為釐。將《史通》文句中重新校正了1142字（其中包括新增入的119字），而完成了《史通訓故》一書。<sup>39</sup>時入清代，《總目》所輯錄的清人有關於評釋《史通》的著作，仍是延續著明人的評釋成果，接續著再做補充與評釋的工作。乾隆十二年（1747），黃叔琳（1672-1756）完成的《史通訓故補》<sup>40</sup>一書，即是繼王惟儉《史通訓故》而續成的論著。稍後，於乾隆十七年（1752）初次刊行的浦起龍《史通通釋》本問世。其中對黃叔琳《史通訓故補》的說法亦間有摭用，而在《總目》眼中，浦氏的註釋顯較黃氏更為精核。<sup>41</sup>浦起龍的註釋雖然遠較明、清以降的各家評釋更加詳備，但是在精於考證的《總目》纂修者們的眼中，其中尚待改進的空間仍多。<sup>42</sup>關於《史通》內容註解與詮釋部分的努力，猶待來者。

#### 四、學術淵源與時局因素影響下的明人史評論著

從《總目》輯錄的宋代史評論著看來，可以知道當時有一些史評著作，是圍繞著《資治通鑑》的問世而出現的。譬如《唐鑑》的作者范祖禹（1041-1098），本身就曾擔任過司馬光（1019-1086）修纂《資治通鑑》的助手。<sup>43</sup>《通鑑問疑》的作者劉義仲，亦是曾經擔任過司馬光編撰時助理的

<sup>38</sup> 《總目》上冊，卷89，頁757。

<sup>39</sup> 《總目》上冊，卷89，頁757。曾經校注過《文心雕龍》的王惟儉認為當時的《史通》版本已遠較《文心雕龍》為佳。（〔明〕王惟儉，《史通訓故》，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79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明萬曆刻本影印，1996〕，頁300-301）

<sup>40</sup> 《總目》上冊，卷89，頁757。

<sup>41</sup> 《總目》上冊，卷89，頁757。

<sup>42</sup> 《總目》上冊，卷88，頁751。

<sup>43</sup> 《總目》上冊，卷88，頁751。



劉恕（1032-1078）之子。<sup>44</sup>而《唐史論斷》的作者孫甫，嘗謄錄自己的作品呈予司馬光本人審閱。<sup>45</sup>除了這些作者與《資治通鑑》有著直接或間接關聯的書籍之外，隨著《資治通鑑》的流傳愈廣，士人的推崇愈高，後世讀《資治通鑑》而發論的史評論著也逐漸應運而生。其中影響明代史評論著較深的是，南宋胡寅（1089-1156）「謫居之時，讀司馬光資治通鑑而作」的《讀史管見》一書。<sup>46</sup>此書抒發史論的書寫風格，《總目》認為，在當時即已影響了一批史評論著的撰述方向。<sup>47</sup>到了明代，唐順之《兩漢解疑》一書，曾摘引胡寅《讀史管見》的說法，再加以自己的意見略加申論。<sup>48</sup>王志堅（1576-1633）《讀史商語》一書，則是針對胡寅書中若干「誤讀通鑑」處加以批駁。<sup>49</sup>由此可知，明朝士人編撰的史評論著，確實受到了前人根據《資治通鑑》敘述的史事，所闡發的史評議論著作的影響。<sup>50</sup>

但是實際上在明代，依照《總目》輯錄的史評類論著來分析，明人直接針對《資治通鑑》敘述的史事而闡發的史評類著作並不多。明人注重的

<sup>44</sup> 《總目》上冊，卷88，頁752。

<sup>45</sup> 《總目》上冊，卷88，頁752。

<sup>46</sup> 《總目》上冊，卷88，頁757。

<sup>47</sup> 如南宋錢時，《兩漢筆記》（《總目》上冊，卷88，頁753）。王應麟，《通鑑答問》（《總目》上冊，卷88，頁754）。南宮靖，《小學史斷》（《總目》上冊，卷89，頁758）等書皆是。

<sup>48</sup> [明]唐順之，《兩漢解疑》，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82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影印，1996），頁799。

<sup>49</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3。

<sup>50</sup> 除了胡寅《讀史管見》一書之外，另一本宋代的編年類史書在明朝也具有影響力。[宋]江贊，《少微通鑑節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明正德九年〔1514〕司禮監刻本影印，1996）一書，在明代曾經由李東陽、張元禎二人校勘訂誤。（《總目》上冊，卷48，頁432。）而田維祐在明正德十二年（1517）閱覽過江贊《少微通鑑節要》一書之後，即在其基礎上，更加斟酌，並附加己見而寫成《東源讀史錄》一書。此書根據《總目》的說法，雖蹈襲《少微通鑑節要》之處甚多，但仍被列入史評類的論著之中。（《總目》上冊，卷89，頁761。）



是，以《資治通鑑》的書法義例或立論精神做為自己著書旨趣的標竿。

除了《資治通鑑》以外，另一部明人極為重視的是，經由宋朝大儒朱熹（1130-1200）初訂的《資治通鑑綱目》一書。因元、明兩代士子推尊朱子，所以《資治通鑑綱目》廣受時人重視，傳刻者極多。<sup>51</sup>元代士人依據《資治通鑑綱目》所參校注釋，或闡發考訂而編撰的相關著作為數不少。<sup>52</sup>在明代，因為帝王獎掖提倡的緣故，朱熹的思想對學術思想界的影響十分巨大。連帶地，明朝士人模仿《資治通鑑綱目》的體例，形成了一股運用「綱目體」書寫史書的時代風潮。<sup>53</sup>因此，對於《資治通鑑綱目》一書的評價最為崇高的時代，實屬明朝。可以說，明朝將該書推到了史學的頂峰。<sup>54</sup>

在這一波學術風氣與學術淵源的影響之下，《總目》輯錄的明人史評論著之中，不乏以奉司馬光《資治通鑑》與朱熹《資治通鑑綱目》二書的書法義例與立論模式為著書宗旨的著作。譬如戴璟（1526年進士）編纂的《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在「凡例」中作者即說明道：「史學之難尚矣。分香實履之奸，非溫公不能知；蜀漢嗣聖之統，非晦翁不能定。」<sup>55</sup>將二書的裁斷觀點，做為作者自身撰書的指導原則。范光宙《史評》一書，開宗明義即標榜是書以「竊附溫公、晦翁微意」為全書宗旨。<sup>56</sup>郭大有《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其評論史事的取材，皆以「通鑑為主，參以綱目」。而其他包括了《春秋左傳》以及《史記》以降歷朝正史的文字敘述，亦為作者

<sup>51</sup>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二）（台北：三民書局，1988），頁238。

<sup>52</sup> 元代士人的相關著作中，最為著名的有二部。一是尹起莘撰寫的《通鑑綱目發明》一書。以及，全書模仿《資治通鑑綱目》之例，將「夷夏之辨」的正統觀貫串到闡釋宋、遼、金三朝史事字裡行間之中，由陳桎撰述的《通鑑續編》一書。周少川，《元代史學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65-71。

<sup>53</sup> 湯勤福，《朱熹的史學思想》（濟南：齊魯書社，2000），頁321-325。

<sup>54</sup> 倉修良，《中國史學名著評介》第二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頁126。

<sup>55</sup> [明]戴璟，《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82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明嘉靖十七年〔1538〕西安府刻本影印，1996），頁474。

<sup>56</sup> [明]范光宙，《史評》，「凡例」，頁588。



評論史事的參考資料。<sup>57</sup>熊尚文（1595年進士）《蘭曹讀史日記》推崇歷代以來，品驚歷史記載者，未有出司馬光、朱熹二氏其右者。<sup>58</sup>此外，除了以《資治通鑑》與《資治通鑑綱目》兩書的撰述旨趣為倣效的對象之外，明人史評論著在寫作格式上，也直接或間接的受到了這兩本書的影響。唐汝詢《顧氏詩史》全書的標題，悉法朱子《資治通鑑綱目》。<sup>59</sup>以及，張溥（1601-1641）《歷代史論》其中第二編的二百三十九個標題，自「三家分晉」到「世宗征淮南」，全部一字不易的抄錄自《通鑑紀事本末》各篇的標題。<sup>60</sup>簡而言之，這兩本書或是企圖從模仿篇目標題的層面，重新體現前人的著作旨趣。

除了前代學術的傳承以外，《總目》輯錄的明人史評論著，同時也深受當世史書編纂風氣與時局演變的影響。明代由於皮藏禁中的列朝實錄准允傳抄，所以私人修纂的本朝史書數量繁多。其中取材，或官修實錄、會典；或私家碑傳、文集，不一而足。<sup>61</sup>明人修史風潮中，數量最多，成就也最大應屬編年類國史的編纂。陳建（1497-1567）編撰的《皇明資治通紀》一書影響尤大。<sup>62</sup>而明萬曆年間譚希思（1574年進士）撰寫的編年類史書《明

<sup>57</sup> [明]郭大有《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88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明萬曆十二年〔1584〕周對峰刻本影印，1996），「凡例」，頁305。

<sup>58</sup> [明]熊尚文，《蘭曹讀史日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86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刻本影印，1996），〈敘〉，頁169。

<sup>59</sup> [明]唐汝詢，《顧氏詩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88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顧正誼刻本影印，1996），「凡例」，頁8-9。

<sup>60</sup> [明]張溥，《歷代史論》，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89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明崇禎刻本影印，1996），「目錄」，頁132-142。[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總目」，頁1-22。

<sup>61</sup> 李宗侗，《中國史學史》，頁155。

<sup>62</sup> 近代學者謝國楨先生曾說：「明代史學自陳氏通紀流傳宇內，人各操觚，遂成一時風氣。其自作一書者，若薛應旂憲章錄、鄭曉吾學編、朱國禎皇明史概、涂山明政統宗、王世貞史料之類，不可悉舉。」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上冊（台北：藝文印書館，1968），



大政纂要》，《總目》敘述「是書所記，自洪武元年（1368）至隆慶六年（1572）。凡大事皆編年記載，每帝皆有論贊。」<sup>63</sup>直接針對明朝皇帝的行事作為，抒發個人的史評意見。實際上，在明代中晚期出版的史評類著作中，也不乏運用借古諷今的手法來影射當世朝局的論著。<sup>64</sup>明朝萬曆年間涂一榛撰寫的《尚友齋論古》一書，內容提及「呂誨彈王安石事」的一段敘述，在《總目》的眼中看來，即為針對當時朝局而發。<sup>65</sup>而明季陳繼儒（1558-1639）的《讀書鏡》一書，文中所稱「人主宮闈中事，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過為排擊」的一段，在《總目》的視野檢視之下，也是作者針對明萬曆年間，朝中有關爭國本事而發的議論。<sup>66</sup>隨著晚明日益動盪的時局演變，明人透過史評論著抒發的，對當朝時局的議論尺度，也隨之愈形激越。茅元儀（1594-1640）在明天啓三至四年（1623-1624）間，在軍務倥傯之餘暇與門人商榷論史而成的《青油史漫》一書<sup>67</sup>，通篇皆是作者為煩憂明季世局的紊亂紛擾，而興發的言論。<sup>68</sup>由此觀之，史評與時論之間的界線，在晚明時期也愈發顯得漫漶不清了。

頁77。

<sup>63</sup> 《總目》上冊，卷48，頁435。

<sup>64</sup> 在明代中期以前也並非沒有類似的著述。不過相對而言，當時還是運用較為委婉含蓄的文字敘述，提出作者自己對於當下時局的看法。例如明成化年間，張邦奇撰寫的《兀涯西漢書議》一書，內容多引明代本朝事例來印證《漢書》所引錄的歷史事件。《總目》上冊，卷89，頁760。

<sup>65</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3。

<sup>66</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4。

<sup>67</sup> 任道斌，〈茅元儀生平、著述初探〉，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第三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頁246。《青油史漫》一書在清代雖曾遭致禁燬，但其鈔本迄今猶存。（〔明〕茅元儀，《青油史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88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清鈔本影印，1996〕，頁476-493。）

<sup>68</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4。



## 五、明人史評論著的歷史教育功能與普及化的應用

明代史學的通俗形式頗為豐富。尤其是對於前人歷史撰述，經過節選、摘錄、重編等方法所產生出來的「節本」、「選本」、「摘抄本」、「類編本」、「重編本」等刊本形式往往皆是明代史書通俗普及化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sup>69</sup>透過《總目》的敘述，可以理解明人史評類著作，在明代史學通俗化的時代趨勢中發揮的功能與扮演的角色。

明代由於史學獲得了更加豐富的通俗形式，從而使得這時期的歷史教育也具有新的特色。<sup>70</sup>因此，明人的史評論著，在明代已經成為鄉塾童蒙教材之中的一種。<sup>71</sup>《總目》所輯錄，唐汝詢撰寫的《顧氏詩史》汲引列朝正史的〈本紀〉以及〈列傳〉部分的史實，編撰為四句韻語，並各加以註解，以便記誦，充為幼童學習的讀本。<sup>72</sup>此外，根據《總目》的說法，呂顥（1523年進士）所編纂的《世譜增定》在明嘉靖年間也是一本甚為普及，廣為鄉塾採用的歷史教材。<sup>73</sup>

而明朝最為著名的一本史評類童蒙課本，當屬張居正（1525-1582）、呂調陽（1550年進士）二人專門為沖齡的萬曆皇帝（朱翊鈞，1563-1620，在位 1573-1620）編纂的《帝鑑圖說》一書。該書內容「取堯舜以來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每事前繪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直解。」<sup>74</sup>當時因為

<sup>69</sup> 瞿林東，〈明代史學特點二題〉，收入氏著，《中國史學散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頁253。

<sup>70</sup> 瞿林東撰稿，〈史學的通俗形式和歷史教育〉，收入《中國文明史·明代》中冊（台北：地球出版社，1995），頁956。

<sup>71</sup> 瞿林東，《中國史學散論》，頁255。

<sup>72</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4。

<sup>73</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1。

<sup>74</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1。



皇帝年幼，爲使皇帝容易理解，所以運用的文字頗爲俚俗。<sup>75</sup>《帝鑑圖說》書中在清代有一個類似的例子，即清同治皇帝沖齡跋阼時，內廷諸臣采輯史事之可以爲法戒者，編輯成書。以此充爲幼年皇帝的歷史啓蒙教科書。（〔清〕鮑東里，《史鑑節要》〔台北：的每一項標題，雖然均爲正面讚揚的褒辭，但是也代表了對歷史上某一位君主的歷史評價。例如形容遠古傳說中的明君「唐堯帝」的標題是「任賢圖治」和「諫鼓謗木」。形容「虞舜帝」的標題則是「孝德升聞」。而書中篇幅最多的當屬述說唐太宗的十三則故事。<sup>76</sup>其用意或許想藉此對初受啓蒙的萬曆皇帝有所啓發。《總目》注記此書的來源是「內府藏本」，其原件或許就是當年張居正進御宮中的原書。<sup>77</sup>而今存的清代刻本，顯然是後人傳抄原書副本，再行輾轉翻刻而刊行的版本，在民間的流通應該也頗爲廣泛。此外，明人史評論著除了做爲鄉塾童蒙的教材，同時，某些史評類史書也充爲舉子們應試舉業的課本。譬如郭大有編寫的《評史心見》一書，《總目》認爲「是書取古人事蹟標題，每事爲論。」<sup>78</sup>該書評史的對象，以《資治通鑑》的內容爲主。並參以《資治通鑑綱目》以及《史記》以降列朝正史與「諸家詠史」等書的內容編纂而成。<sup>79</sup>在參考的書籍內容中，凡是作者認爲可以爲策論考題者，無不擇取，以利於舉業。<sup>80</sup>如此看來，此書實爲一本專門針對爲應付科舉考試的士子們所特地準備的史評類書籍，些許達到了普及社會的功用。

在明代中晚期，漸漸地出現了一些脫胎於史評類，但《總目》將之歸類於〈史部·史鈔類〉的著作。這些書籍與史評類論著，兩者之間的區別

<sup>75</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1。

<sup>76</sup> 〔明〕張居正、呂調陽，《帝鑑圖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82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清純忠堂刻本影印，1996），「目錄」，頁307-309。

<sup>77</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1。

<sup>78</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4。

<sup>79</sup> 〔明〕郭大有，《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凡例」，頁305。此書原名即爲《評史心見》。

<sup>80</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4。



即在於，凡是純粹輯錄歷代史書論贊，不摻以作者個人議論的，則歸於史鈔類。另一方面，充塞作者「品驚舊聞」或是「抨彈往迹」之類史評見解的著作，方為《總目》分類之中屬於〈史部·史評類〉的著述。<sup>81</sup>簡言之，凡是僅「摘錄於諸史」，而「非所自評」的論著，皆被納入〈史部·史鈔類〉的輯錄範圍。<sup>82</sup>

明代摘錄諸史論贊成篇的著作，在《總目》之中輯錄的，首見有項篤壽（1562年進士）編輯的《全史論贊》一書。此書即為專門摘自《史記》至《元史》歷朝正史的「論贊」所完成的一部著述。<sup>83</sup>晚明萬曆年間，彭以明《二十一史論贊輯要》一書，也是一部採錄諸史論贊而成的著作。<sup>84</sup>其成書旨趣，在於因作者有感於二十一史篇帙浩繁重大，覽不易竟，因此摘取其中論贊，俾使三數千年評贊義例犁然在目。<sup>85</sup>稍後出版的，沈國元《二十一史論贊》的內容，除了摘錄二十一史的論贊外，並且加以圈點評釋，全如批點時文的格式。<sup>86</sup>顯然也是另一部為了適合士子應試學業的需要而刊行的著作。相關著述的社會普及功能，在晚明時代也因而愈加顯著。

## 六、結論

透過《總目》對於明人史評論著評述，可以瞭解明朝士人撰寫的史評類型著述的學術淵源與時代影響。《總目》基於自身政治立場與學術觀點的考量，認為明代的史評類著作多乏學術的根柢。然而，分析《總目》所

<sup>81</sup> 《總目》上冊，卷88，〈史評類敘〉，頁750。

<sup>82</sup> 《總目》上冊，卷65，頁580。

<sup>83</sup> 《總目》上冊，卷65，頁580。

<sup>84</sup> 《總目》上冊，卷65，頁581。

<sup>85</sup> [明]彭以明，《二十一史論贊輯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47冊（台南：莊嚴文化，據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彭惟成等刻本影印，1996），頁236。

<sup>86</sup> 《總目》上冊，卷65，頁581。



輯錄，明代有關評釋《史通》著述的成書背景，可以清楚的得知，若無明代中、晚期士人對於《史通》版本刊正工作所做的貢獻，則延續至清代有如《史通通釋》一類被公認為詳備可考著作的出現，就缺乏了由歷史成因所凝斂出推波助瀾的助力。另一方面，根據《總目》所述，明人史評論著對於歷史材料的掌握，既不如「臣光曰」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的論贊形式<sup>87</sup>，也比不上朱子「皆是根據歷史情實而加以評述」<sup>88</sup>的裁斷格局。但是從歷史淵源的脈絡來分析，可以發現明人史評論著當中不乏以司馬光《資治通鑑》與朱熹《資治通鑑綱目》二書之書法義例與立論精神為撰述宗旨的著作。

依據《總目》的評述，參照明朝的歷史發展過程，可以發現明人史評論著受到時代影響與影響時代若干例證。明朝由於私人撰寫當代歷史的風氣盛行，又在明代中、晚期世局動盪的雙重因影響之下，晚明時期出版的史評論著中，也不乏運用借古諷今的手法來影射當世朝局的著作。此外，明代由於史學取得了愈形豐富的通俗形式與普及功能，從而使得此時的歷史教育也具備了新的時代特色。因此，明人的史評著作也開始影響時代社會，成為鄉塾童蒙與應試舉業教材中的一種。再者，隨著晚明時代小說與戲曲的興起，受到了社會上廣泛的歡迎。<sup>89</sup>在明朝流行的通俗小說<sup>90</sup>，或是戲曲創作的編排之中<sup>91</sup>，都可以發現想要藉由史論評述在其中發揮畫龍點睛

<sup>87</sup> 遠耀東，〈「臣光曰」些什麼〉，收入氏著，《魏晉史學及其他》（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98），頁292-293。

<sup>88</sup> 錢穆，《朱子學提綱》（台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1），頁180。

<sup>89</sup> 余英時，〈明清變遷時期社會與文化的轉變〉，收入余英時等著，《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頁39-42。

<sup>90</sup> 例如明代小說《警世通言》之中曾條列若干「本朝事勝前代」一類疑似攸關「朝代間的比賽」的史論意見。楊聯陞，《國史探微》（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附錄：朝代間的比賽〉，頁45-47。

<sup>91</sup> 譬如明末清初的戲曲家李漁嘗撰有百餘篇的史論，以及《綱鑑會纂》與《古今史略》等史學專書。李漁的創作思緒悠遊於戲曲編排與史事品評之間的靈活交流，不僅豐富了他在劇中描繪歷史與社會悲劇的主題意識，同時也更能掌握其中歷史人物與事件原貌的深刻內涵。（黃麗貞，《李漁研究》〔台北：國家出版社，1995〕，頁66、142-150。）因



作用的例證。史論、時論與通俗文化的遇合，亦可視為晚明思潮的發展過程中，未可輕忽的一項時代特徵。

根據《總目》的評述，也可以發現清朝初年的史評論著，在內容與格式上都受到了明人史評論著的明顯影響。僅直接襲用明人史評書中內容的就有，孫廷銓（1613-1674）《漢史億》、華慶遠《論世八編》、黃鵬揚《史評辨正》、賀裳《史折》、以及仲宏道《增定史韻》等數種。<sup>92</sup>其中蘊涵的，在世變與學術的雙重影響下，清代史評論著與明代史評論著之間所顯現的若干異同特性，或猶待進一步的探討。

---

此，這也成為了李漁作品表現突出，令人贊嘆不已的一大藝術特徵。（高小康、《市民、士人與故事：中國近古社會文化中的敘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232-236。〕）

<sup>92</sup> 《總目》上冊，卷90，頁766-767。

